

与延安时期精兵简政

毛泽东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

A84
54

88319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1567/5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精兵简政

刘益涛 编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精兵简政

刘益涛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印张 6插页 158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419-5128-5/9·4417

定 价: 9.60元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彭 真 马文瑞
主 编 杨植霖 强晓初
副主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王巨才 赵喜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巨才 王海珠 孙钱章
刘益涛 刘孟泽 杨植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宋 柏 范 平 赵喜民
萧少秋 曾宪新 强晓初
廖广洲

D. J. / 05

总 序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大型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重点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进行的艰辛开拓和卓越奉献。

这一历史阶段,即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继井冈山时期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政治上开始成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能力。后来,“左”倾的错误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转移。长征,有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要是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不能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驾驭中国革命持续胜利发展。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纠正了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有能力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整风学习的方法,教育全党

的干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成就更加巨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的坚实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中，是内容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以这一历史阶段写得最多；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人民群众的创造，划清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线；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初步规划；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扬和培育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了党内不良的作风，集中地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创性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导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全国人民可以从中多方面地汲取营养，增长智慧，取得借鉴，开拓今日的事业，奔向光辉的未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该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最主要的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这套丛书的编写，许多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丛书的编写出

版,只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开端,愿同各方面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共同把这项事业开展下去,逐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推动今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年7月1日

目 录

前 言	(1)
上 编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	(1)
一、只要你提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	(1)
二、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	(7)
三、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	(10)
四、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	(16)
五、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20)
下 编 延安时期精兵简政纪事	(26)
1939 年	(26)
1940 年	(28)
1941 年	(32)
1942 年	(52)
1943 年	(164)
1944 年	(208)

上 编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 精 兵 简 政

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的第一次精兵简政。是抗日根据地克服物资缺乏的极大困难,提高领导机关工作效能的重要措施,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克敌制胜的十大政策之一。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极其重要的政策”,就此作过不少指示、讲话,并写文章专门论述这个政策的重要性。精兵简政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实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达到了毛泽东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①,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好了充分的物资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总结这一历史经验,不仅对于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坚决执行党在十四大提出的机构改革的艰巨任务,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只要你提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

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是党外人士李鼎铭首先提出来的。1941 年 11 月 6 日至 21 日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在开幕那

天，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共产党人要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希望党外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抗日救国大计提出意见和建议^②。当时还是米脂县参议会会长的李鼎铭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深受感动，他带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根据边区群众这些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与其他 10 名参议员一道向会议提出一个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要求“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提案理由是：“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提案还提出解决财政困难的五项办法，其中第三项是：“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③。

这个当时被编为 81 号的提案一经提出，在参议会上立即引起反响，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反对意见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要裁减政府工作人员，民主政权如何巩固发展”，甚至还有人以李鼎铭是党外人士，怀疑他提出精兵简政的动机纯不纯。毛泽东看到这个提案，非常重视。他用红笔把其中的重要段落圈起来，又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旁边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④。毛泽东肯定了这个提案，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进行了批评和说服工作。

毛泽东肯定精兵简政的提案主要有两点：一是切中时弊，指出了我们的毛病；二是找到了对症药，也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什么是我们的毛病？就是“鱼大水小”。“鱼大”就是脱产人员太多，“水小”就是人民负担过重。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7年边区刚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1.4万人；1938年也仅1.6万人；到1939年一下增加到4.9万人；1940年剧增到6.1万人；1941年已上升为7.3万人。脱产人员猛增，造成机构庞大臃肿，机构庞大臃肿就会带来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194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曾规定各区域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脱产人员不能超过全人口总数的3%^⑤，但当时实际已达5.4%，势必加重人民的负担。以边区人民交纳公粮为例：1938年仅为1.5万石；1939年增至6万石；1940年上升为10万石；1941年则剧增到20万石，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平均每个农民要负担1斗4升（合42斤）粮食。1941年6月发生边区一农民借雷电劈死人说怪话的事件，就是部分群众对负担过重产生不满情绪的反映。

对于“鱼大水小”的矛盾，毛泽东早就有所觉察，但解决矛盾的办法主要是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机关部队学校脱产人员进行生产自给。1939年春耕和秋收季节，中共中央都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每次都出席并发表鼓舞人心的讲话。他在2月2日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指出：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这4万人在过去，不知道怎样生产，也没有功夫生产，而事实上也不必要生产。在中央苏区，各机关粮食多得很，因而也不必要工作人员去生产；同时，那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紧张的，处在包围战争的环境中；再则，那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

来生产。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处在新的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在历史所造成的落后经济的陕北，显然的，经济是较困难了，因此，就要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现在虽同样是战争环境，但这同过去是不同的；各机关的工作虽然一样很忙，但在新的环境，即在国内和平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工作忙的程度也有些不同。讲到经验，现在也有了，去年留守兵团部分地进行了生产运动，他们日常生活改善了，冬天解决了鞋袜问题。过去有部队的战士们冻足冻手，现在这种现象消灭了，这也是进行生产之功。所以无论部队机关，这种生产运动必须开展起来，大家种菜喂猪，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⑥。9月25日，毛泽东在秋收动员大会上讲话，他首先指出边区今年生产运动完成了3万石粮食，自己解决了一年所需的一半，这已不算小事了。今天开秋收动员大会，大家再努力，便可把已到嘴边的粮食，装进我们的肚子里面了。同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以后边区吃粮困难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4万人，这4万人吃的粮食一半是由老百姓帮助解决的，另一半还没有来源，怎么办呢？饿死吗？不成！解散吗？也不成，那末，只有走第三条路，自己动手来解决，这就是我们的回答^⑦！

1941年6月以后，陕甘宁边区群众对负担过重反映强烈，毛泽东在处理好皖南事变等一系列重要工作后，把注意力比较集中地转向经济工作方面。这一时期，毛泽东与谢觉哉就边区经济工作，如运盐等问题曾多次进行商讨，设法解决边区经济工作中的争论问题，提出发展经济、平衡出入口的方针，督制1942年经济预算，并设想从1942年开始统一经济，实行统筹统分政策。随着这些经济工作的开展，必然会产生对机构、人员的调查与重新确定。194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讨论了关于改革中央机关的组织机构问题，决议“中央机关的任务，为研究情况，掌握政

策,总结经验,调济干部,其组织以精干为原则”;“中央各部委组织,须按上述原则,重新编制”。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已经成立了由任弼时主持的“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还决定延安一些学校的合并问题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分工问题^⑧。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规定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形式;决定成立中央调查局,毛泽东兼任局长;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会议还决定了中央各部委的编制,如宣传部,干部19人,事务员15人,马5匹;组织部,干部16人,事务员11人,马4匹;统一战线部,干部18人,事务员12人,马5匹;财政经济部,干部14人,事务员7人,马2匹;中央青委,干部10人,事务员11人,马4匹等等^⑨。这些情况说明,在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前,毛泽东也在探索解决矛盾的对症药,把开源(生产)与节流(缩编)两个方面逐渐地结合起来,所以毛泽东采纳李鼎铭的提案是必然的。

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肯定精兵简政政策,他说:1942年度边区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两大原则:第一精兵简政,调整人员;第二扩大收支,发展生产^⑩。在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下,11月18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以165票多数通过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二届参议会闭幕后,12月3日陕甘宁边区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训令。12月4日又发出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⑪。这样,实行精兵简政的工作,不仅在陕甘宁边区,而且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采纳精兵简政提案这件事，不仅说明精兵简政这个提案提得及时，提得好，对抗日事业有好处，而且还在于打破一部分共产党员不愿同党外人士合作的宗派情绪，把精兵简政政策提到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的高度，予以充分的重视。11月21日，毛泽东在二届参议会闭幕会上说：“开了十五天会，闭幕了，大家热心，我觉得开得很好。总结起来有两大成功：第一，暴露了我们许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第二，这是个很大的学习，使共产党员向党外人士学习，……”他号召要反对两种主义，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实事求是，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打破，革命将不能成功^⑩。半年以后，即1942年7月8日，当李鼎铭回忆这段往事时，还深有感触地说：“当我提此案时，曾趑趄至再，并经友人数度劝阻，但我在边参会上，目睹共产党对于民主合作，完全出于至诚，乃毅然提出，结果非但未遭反对，且受该党人士热烈赞助，而经大会接受。”^⑪可见，党采取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的政策影响之深。就在二届参议会期间，由毛泽东提议，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⑫。不久，李鼎铭全家由米脂县搬到延安来住，搬家前李鼎铭将全部家产献给了当地政府。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对李鼎铭说，还是留一点吧！李鼎铭说，一点也不留。毛泽东就此赞誉他为“开明绅士”。后来，毛泽东还多次批评党内同志听不得党外人士不同意见的宗派主义情绪。1944年9月8日，他在悼念为公牺牲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时，作了一段著名的演讲：“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

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⑧毛泽东把采纳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提高到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的高度，是有深远意义的。

二、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

1942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对各抗日根据地执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发现，“一般已开始在做，但均做得很不够”^⑨。有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发生明减暗不减，上层减下层不减，前方减后方不减的现象。还有一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对于这一政策的执行，是很勉强的，被动的，因而也就没有普遍贯彻。甚至还有很少数的地方不管中央如何决定，仍然是“原封不动”，“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更有极少数地方不但根本尚未开始精兵简政，反而还想扩大部队增设机关学校。凡此情况表明，精兵简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引起应有的认识，在他们的思想上对这一政策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和片面的观点。从当时调查到的情况看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只强调将来要发展，不愿意在今天进行精简的“远视眼”；二是只看到今天还能勉强过得去，不顾将来严重环境一定到来的“近视眼”；三是只晓得“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不懂得兵多关键在于能否养活的“多兵论”；四是只认为机关大、干部多，人多好办事，不理解机关林立、系统纷繁、人浮于事，工作效率反而降低的“繁政论”。这些错误的思想，究其根源是复杂的，从深层上探讨，包括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但从认识论上来说，是一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问题。为着彻底执行精兵简政，首先必须扫除思想障碍，也就是说精兵简政首先要从思想

上贯彻,然后才能够在组织上落实。为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始终没有停止扫除思想障碍的工作,从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起,就不断在《解放日报》上讨论精兵简政,帮助大家提高思想认识。

毛泽东认为,对于精兵简政“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⑦。所以,他在著文、讲话、发指示时多次首先说明这个问题:精兵简政是糊里糊涂的提出还是确有需要而提出来的呢?项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确当的^⑧。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抗日武装刚刚建起,还没有发展壮大就提出精兵主义,当然是不对的。那时的抗日政权也在初创时期,没有巩固,提简政也是不对的。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的队伍发展起来了,但根据地在缩小,即“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⑨。这是因为抗日战争进入第五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人力、财力消耗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停发军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这是因为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使得抗日根据地必然要缩小。而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队伍和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允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

毛泽东抓住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认识事物凝固不变的特征,教

育全党的认识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1942年9月7日,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运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松松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他还特别指出机构精简后,队伍整编后,精小能胜庞大的道理,他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②。毛泽东希望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孙行者和小老虎,从而战胜那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办法就是“变一变”,精兵简政,我们的身体变小,但更加扎实了,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这种充满辩证法的智慧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全党摒弃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掌握唯物辩证法,就会自觉地克服对于精兵简政政策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思想澄清后,就会认真地主动地愉快地去实行,也才能真正实行好。毛泽东在说明精兵简政的必要性时,把它提到认识论的高度,正如当时《解放日报》一篇社论总结的那样:精兵简政,这一口号所以提出,从某方面讲,全部意义也就是一个:实事求是^③。这样,就把它与教条主义对立起来,与当时党内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党风的运动结合起来,以整风来推动精简,以精简来检验整风的成果,从而取得精神的与物质的